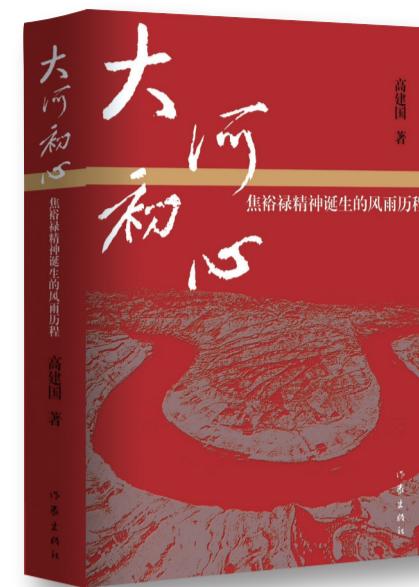


# 探究崇高精神的生命之源

——评高建国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

□焦凡洪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百年蔚为壮观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模群阵,其所呈现的思想精神既美美与共,又各美其美,由此在中华民族精神的长空闪烁了一道璀璨星河。上世纪60年代涌现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无疑是和平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典型代表,那么在他身上体现着怎样的精神特质?为什么一个“官”的形象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光耀在国人心头,与老百姓贴得最近?这是跨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我们更需了解和思索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可谓恰逢其时。这部作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宏阔的历史纵深描写了焦裕禄精神的诞生和传承过程,在全面展现焦裕禄事迹中既廓清了其精神共性,又解析了其个性,将之崇高精神的生命之源层层剖解开来,使我们透过人物本色领悟精神本质,给人以英雄初心灿烂、引领我心飞翔的感奋和激励。

作品的前半部分,作者以深入细致的采访和接地气的叙事表现了焦裕禄由一名穷孩子成长为县委书记的经历。应该说,焦裕禄从参加民兵队伍,进行保卫解放区的斗争,到参加南下干部大军、进行建立新政权的斗争;从以新中国技术人才身份北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到走上车间主任岗位重回洛阳矿山机器厂参加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是其精神的发轫阶段。作品把潜心打捞的历史生活碎片进行艺术衔接,溯源了焦裕禄人生奋斗的足迹,从中我们看到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智勇双全、舍生忘死的焦裕禄;一个在书桌机器旁刻苦钻研、坚忍不拔的焦裕禄;更看到党的科学理论对他思想精神的滋育和党的各级组织对他能力素质的培养。由此他在走上县一级领导岗位之后才在工作指导下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在与严惩自然灾害斗争中运用正确战略战术,在带领人民群众改变贫穷命运中做出无私奉献,也使他成长为领导干部的楷模成为一种必然。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近一年半时间,是其精神的集中形成并完美展现时期,对此,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那篇著名通讯作了经典表达。本作品没有重复通讯内容,而是重点围绕焦裕禄精神生成的动因进行了探求和显现:这首先来自他坚定的信仰。作者以独家考证讲述了焦裕禄上任兰考县委书记的一波三折:他在尉氏县就是列于第一书记之后、县长之前、被称作“一点五书记”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上级调他到兰考本来是接任县委第一书记的,可他又经历了任命他为主持工作的代理第二书记、第二书记的过程,直到他病逝的三个月前,他的县委书记职务(此时不再设第一书记)才实至名归。对此他毫无怨言,按照他的话就是:“党员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他就是这样一个心眼听党话、跟党走,以病弱之身挺起了精神的脊梁。他为百姓立心,为群众舍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作品中我们既窥见了他带领全县人民治理“三害”、拔除穷根的宏图大展;又感受了他“喊着爹叫着娘”为老百姓服务的小事入微。初心赢得民心,他的精神便充满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于是,抗击“三害”的“扎针”“贴膏药”等一条条锦囊妙计接踵而出,“韩村的精神”“寨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等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使兰考的“流民图”变成了丰收景,写就了“为了谁、依靠谁”的精彩答案。

人民利益至上,紧紧依靠人民。焦裕禄以血肉之躯燃亮灵魂之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那段遗言:“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希望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这是何等无私无畏的高尚境界,这种生命的绝响怎能不使蕴藏的精神爆发出无尽能量!历史正是把握了这一精神的脉冲,使其在党的宣传文化阵地回响开来,成了震撼亿万人民心灵的黄钟大吕。作品的后半部分,将现场置于时代的聚光灯下,真情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焦裕禄的形象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故事,并由表及里地透析了这一精神形象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及恒久不衰的原因。

政声人去后,民心祭英魂。焦裕禄病逝后,兰考干部群众学习缅怀他的故事感天动地:在省召开会议期间,兰考县20多名农民代表到郑州革命公墓拜谒焦裕禄陵墓,一些代表哭倒在坟前长跪不起;按当地风俗死者的遗物

一般都是焚烧或处理掉,而时任县委新闻干事的刘俊生却将焦裕禄的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和那把为压迫肝癌疼痛用硬东西将椅靠顶了一个窟窿的藤椅珍藏了起来;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在全省林业工作大会上的发言竟“跑了题”,声泪俱下地大讲焦裕禄事迹……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正是从这种极可宝贵的民意中登高望远,看到了焦裕禄形象在党员领导干部方阵中的标兵作用,看到了焦裕禄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大厦的支撑价值,于是他们呕心沥血打造新闻精品,进而带动国家宣传舆论阵地鼓号齐鸣,把一个和平时期人民公仆的感人形象推向前台,光彩夺目矗立在全国人民心中。

你为人民鞠躬尽瘁,人民为你永铸丰碑。作品用大量感人至深的细节,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焦裕禄精神的呵护、爱戴与高扬。1966年2月,当焦裕禄遗骨由郑州迁葬兰考时,县城万人空巷,火车站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百姓自发地披麻戴孝,哭喊着:“焦书记回来啊!”虽然英雄已经逝去,但他的精神却在人民心中永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兰考县农民魏现堂父子两代接续守护“焦桐”,使其拔地参天、繁花盈枝。“焦桐”根深叶茂、生生不息,不正是焦裕禄精神之树常青的最好说明吗?

因为焦裕禄精神来自人民的源头活水,所以她在党的阳光哺育下与时俱进。作品告诉我们,兰考县委一任任领导班子在传承焦裕禄精神中接力奋斗,使兰考摘掉“贫困县”帽子,在决战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走在了前列。在焦裕禄身后,党和国家又涌现出孔繁森、杨善洲、郑培民和在脱贫攻坚中模范践行焦裕禄精神的一大批党员干部先进典型,使初心使命彰显出时代光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倡导学习焦裕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把兰考县定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他指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这就使焦裕禄精神走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殿堂的新境界,更显真理的光芒。

焦裕禄生前拼搏、死后融入的兰考这片土地,正处于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上。悠久丰富的黄河文化培育了焦裕禄精神的骨骼,壮大了其大河赤子的形象,黄河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由此也表明,从人民中汲取生命营养、为人民美好向往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精神,是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作品通篇激扬的对黄河文明的讴歌,增强了主题的厚重,给人以奋发新征程的力量。

# 时代洪流下的现实演绎

——读李门长篇小说《情荡红尘》

□王卓森



李门的这部长篇,就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一位普通体制内教师所经历的人生轨迹。叙事的现场从内地高原一座小城来到海南岛大特区,人物的冲突从一个败落于一场爱情阴谋的知识分子到精神病医院的出逃者,再到一个传奇的闯海者,演绎了一出当代基督山恩仇记。海风中有主人公的红尘往事,奋斗中有时代的震撼发声。在历史的大环境下,被未知命运所裹挟的小人物,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更能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之动容。

1988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海南宣布建省办经济大特区,一时间,海南从祖国的边陲小岛变成人们追求财富与机遇的沃土。小说的主人公曾凯力也是踏上这座岛屿的淘金者之一,不过他出走的背后却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故事,曾原本是一名西南小城里普通中学教师,却因意外发现自己的妻子鲁凤和当地主管科教文卫的一把手韩鹏程部长的奸情并执意捉奸,而被当做“精神病”软禁在当地一所特殊的安宁医院。随后,曾凯力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逃脱出将被终身软禁的绝望困境。他一路逃亡、一路躲避来自韩部长势力的追捕,在机缘巧合下踏上了海南岛这方梦幻般的天涯热土,在悠悠椰风和时代喧嚣之中,开始了一段命运沉浮的人生之旅。

随着时间的流逝,曾凯力一方面同韩部长派到海南岛追捕他的眼线斗智斗勇,一方面在许多“贵人”的帮助下,乘着市场经济的春风,在海南岛一步步构建起了自己的商业王国,实现了自我价值与财富自由。故事似乎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再现,但又不可能是现实的平移,而是作者对生活经验处理后的另一种带有浓郁理想主义色彩的现实书写。小说不是一场离奇情爱海岛闯荡的流水记录,而是在时代的深度介入下灵感萌动所再创的一种现实,这种现实来源于作者的生活发现、思考维度与美学价值观,以及作者文学镜像下和生活剧场里的一个故事。

不难看出,这虽然一个平凡小人物落难

损的部分给予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样的,文学作品中的悲剧成分勾勒出的缺憾,可以拓宽其审美价值的深度和广度,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本书接近尾声时,虽然主人公曾凯力与其妻鲁凤最终重逢于椰城,可来自韩鹏程部长眼线的追击却让两人阴阳两隔,弥留之际的鲁凤倒在血泊之中,因爱的孽债而隔绝数载的夫妻两人如今却在这种情境下重逢。这一幕令读者为之动容,也为小说增添了几分悲剧美学的色彩。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开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尤其在各个经济特区中,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构成了城市的血脉。经济特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让众多有志之士看到了希望。在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时就有高达十多万人才南下拥入海南岛,小说《情荡红尘》的作者李门先生也是这些追梦者中的一员,从小说中各个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命运遭遇以及当时海南岛开放大潮下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民众观念等状态来看,创作灵感和故事底料应该大多都来自于作者在那个年代的亲历和真实的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笔触一转,出现了十分当下、有幻想小说特质的一幕。被确诊患上肝癌的曾凯力,运用他所投资的仿真机器人技术,以其妻鲁凤为雏形打造了一款仿真机器人,并与“新生”的鲁凤前往一座无名岛共度余生。当下,人工智能AI技术被人们认为是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在任意载体上复制和构筑意识的话,那么情感与思考将不再是人类的专利,人类与机器的界限将会模糊,我们是否对于这种未知的社会形态做好了准备呢?这也是作者带给读者的别一种思考。

这部杂糅了爱情、背叛、逃亡与淘金梦的长篇小说,是时代洪流下的现实书写,是一幅精心描绘的20世纪末中国社会风情画,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俱存。

断臂的维纳斯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所缺

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第一批作家,蔡骏被誉为“中国悬疑小说第一人”,出道20年,一直保持令人艳羡的创作状态。他擅以“心理悬疑”构起疑窦丛生的小说形式,以及最终指向人心人性的肌理内核,既高产又能保持篇篇不同的新鲜感。近些年,他始终保持对“夜”的执著,从精选集《最漫长的那一夜》到如今长篇小说《春夜》,“夜”之意象成为其作品悬疑诡谲气氛的重要配色。不同的是,《春夜》少了离奇曲折,多了具体可感的地域历史细节,悬疑是现实题材的一抹配色,对城市与时代的怀旧成为小说的真正底色。离类型文学远了,与纯文学写作近了,显示出作家打破类型小说疆界的野心和实力。

《春夜》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围绕上海春申机械厂在中国社会变革下的百年兴衰存亡,以新、老工人张海、神秘亨特、保尔·柯察金、冉阿让、钩子船长等为主要人物,以厂里曾经发生的两起悬案为线索,通过人物不同的人生际遇,牵引出一系列与时代命运环环相扣的沪上往事,展现了千禧年前后上海的日常生活图景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史,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悬疑氛围和现实主义色彩。此外,小说语言颇得沪语精髓,与大量上海市井生活的风俗民情、地理空间描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春夜》鲜明的海派气质。

## 一、悬疑为配色,怀旧为底色,现实为旨归。

在蔡骏变化万千的笔下,悬疑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小说类型,愈发成为一种随物赋形的气质与表达方式,任其所用。他曾解释“悬疑”:“不一定是灵异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别人的命运,或者被别人改变命运,这就是所谓的悬疑”。《春夜》拿出作家“蔡骏”的真实身份,使小说叠合了个人真实的成长经验。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从始至终的目击者与参与者,这一限制性第一人称视角,虽然增加了厘清事件全貌的难度,却大大增强了代入感和真实的历史细节,夹带了作者关于上海回忆的独特“私货”。

《春夜》是蔡骏睽违三年的长篇小说,充满了作者的私人记忆,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作者的家庭自传。它们来自上海与苏州河畔的童年经验,来自其父母的生平,刻意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疆界,使悬疑元素的身影模糊。在“后记”中,蔡骏自言少年时代父亲供职的工厂,和那个还未谋面就已销声匿迹的父亲的徒弟,给他带来了历史沧桑感和生活的偶然感,并成为《春夜》的灵感来源之一。

国营老厂的变化牵动着工人命运,折射出魔都的城市变迁,《春夜》聚焦的上海,是粗粝的父辈工厂中的上海,不是法租界精致洋房里的上海;是冰冷的梦破碎的声音,不是华丽的冒险家的乐园;是时代转换点中平民百姓的日常,不是大时代下光鲜人物的传奇。改革开放、国企转型、国际风云变幻均是小说鲜明的大背景和大视界,反映了以现实为旨归的叙事导向。与之相对的个人狭小视角,如童年记忆、青春成长叙事和个人遭遇,带着怀旧色彩,试图重现老市民回忆中的市井气息。

小说故事时间线跨越改革开放40年,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像生产汽车机械部件,拿我生产到社会主义社会”,到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我”年近不惑,已为人父。主人公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上海春申机械厂的历史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写照:1931年由归国留学生创办,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株式会社接管,1956年公私合营收归国有,世纪之交开始股份制改造,继而破产清算。上海春申机械厂的命运沉浮,从忙得四脚朝天到产品积压。作者有意识地将机械厂的命运沉浮,从忙得四脚朝天到产品积压。作者有意识地将机械厂的命运,放诸国际大背景中: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父亲从部队员,分配到上海春申机械厂;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我父亲在厂里跟人动手;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厂子破产清算;2001年美国发生“9·11”惨剧,厂子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宏大与细小的对比,在戏谑中消解了历史沉重感,取而代之的是标志性时间节点带来的历史感和共鸣,翻开历史的尘埃,钩沉出上海百年,这是小说现实主义的来源之一。

蔡骏灵活地拿起“悬疑”的武器,让小说主人公“我”拥有从小被人托梦的奇异功能,不时有逝者通过梦境向我托付心事,上至大作家卡夫卡、女明星阮玲玉,下至一只猫。于是,我在梦境与现实的阴阳两界自由穿梭,替魂灵传话,了结其心事,也为活人指点迷津,知晓秘辛,推动小说的前进。《春夜》的悬疑气氛主要由两件悬案贯穿:1990年厂里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建军被人一刀捅死,凶手未知。2001年新厂长“三浦友和”带着全厂职工的集资款潜逃,抛弃妻子,下落不明。《春夜》没有被写成单纯的探案小说,悬案只是吊起读者胃口的调味剂,特异功能也仅仅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蔡骏不再对类型小说中的突变、反转过分执著,甚至直到结尾也未揭开谜团。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设置阴阳交界处的托梦人,是在追逐梦境的过程中,弥合过去与未来的断裂,运用超现实的功能实现对现实的寓言式点拨。

蔡骏用鲜活的上海词汇,将这些魂魄称为“魂灵头”,赋予了它们除却灵魂之外,更具心灵化、精神化的无形象征。它比灵魂更加轻灵,更富人性而非神性,在沪语中,活人也应该具有魂灵头,不然好比迷失心窍,失去了本质。在“我”从小不断与魂灵们打交道的同时,也在目睹着城市的灵魂头逐渐模糊,作者在历史变迁过程的褶皱中,寻找上海的魂灵头,如此一来,小说的底色不是悬疑,而是怀旧。小说中,老厂长的意外车祸带走了机械厂辉煌的过去,新厂长的出奇失踪意味着厂子的寿终正寝,大时代弹指一挥间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小人物只能眼睁睁地见证大时代车轮碾过的残酷。全球化语境中的工厂员工们,一下子也失去了各自的魂灵,工厂中悬案引起的悬疑感,意味着普通人生命运的漂泊无定。

## 二、沪语写作与海派气质。

海派小说素来擅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于人情往来、穿衣吃饭的滴滴点点间描画日常生活,塑造人物形象,突显独有的海派气质。《春夜》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特点,以明白晓畅的改良沪语写作,留意城市风景变迁的描写,着力通过文字细节,还原千禧年前后的市井上海。小说叙述语言多采用文言四字句式,一目了然且有古意,人物间的对话以改良的沪语为主,常常出现“烛光、一只鼎、摊了一天世界”等俚语俗语,既保留了典型市井的鲜活韵味,又保证了普通读者的理解,加上方言的留白艺术,奠定了小说不疾不徐的语言和腔调。

在作者的眼中,“上海好像一条蛇,一直在蜕皮,一直都是新的”,而新与旧的接缝处,正是挖掘故事的富矿。《春夜》的上海故事围绕着蜿蜒的苏州河,它承载着泥沙俱下的往事,也是上海城市演变的缩影。蔡骏自小生长于附近,对它自然十分熟稔:“苏州河有味道,天地独一份,雨天腐烂味道,千丝百转,阴天牙膏味道,催人泪下,晴天酱油味道,馊吐水嗒嗒滴,东边日出西边雨,泔脚肚头味道,发馊三日,必要捏住鼻子”。直至若干年后世事变迁,机械厂不复存在,苏州河也“早已变换味道,腐烂味,牙膏味,酱油味,泔脚肚头味,烟消云散,泥土清香也不闻,一河清汤寡水,徐徐东流去”,沪上风物与改良沪语相得益彰。叙事的间隙,小说对上海都市景观的描写比比皆是:大自鸣钟、老虎窗、卢湾区、曹杨新村……这些上世纪的遗留物,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逐渐烟消云散,导致归属感的丧失,使老上海人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故土却产生“都市乡愁”。

海派气质在一面怀旧、一面拥抱国际化的矛盾中形成,显示出面对人生无常的冷峻和泰然。在日新月异的魔都,惟一不变的,也许只有变本身,对待死亡亦是如此。《春夜》中多次出现葬礼与吃“豆腐羹饭”(葬礼酒席)的情节,但这些关乎死亡的过程,并没有被写成伤感的悲剧,反而在觥筹交错间充满市井烟火气,利用人物悉数到场的小场面,在七搭八搭的交谈中塑造人物性格,介绍人物来龙去脉,引出矛盾冲突。

此外,小说人物语言的选择颇费心思。作者根据人物的身份选取不同方言,甚至不同区域的上海口音,巧妙地配合情节发展。“我”的发小张海,自小和知青母亲在江西长大,少年时才回到上海的外公家,讲着一口“有点滑稽”的洋泾浜上海话,却努力想扮成地道的上海口音,“每个字拼老命靠近静安寺,一出口,却飞到江湾五角场,飞到青浦朱家角,到我耳朵里,就成了苏州话,苏北话,苏联话的混血儿”。70周年厂庆前,他每日午休时,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地跟着磁带学唱。最终表演出用“坐标南京西路,静安寺”的正宗老派上海话的说唱《金陵塔》,震惊四座。张海坎坷的成长经历、契而不舍的毅力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成为他之后为完成外公遗愿,满世界追踪新厂长下落的铺垫。

小说提及王安石的诗《春夜》:“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借主人公之口评论它“看似不动声色,只讲香炉,轻风,月影,却是静水深流,暗潮翻涌,只待来日,扭转乾坤”。小说《春夜》何尝不是如此?在看似悬疑的背景设置下,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魂灵头、吃羹饭、讲故事等一干不关解悬疑的日常,浮光掠影间从小说的外语言形式到内在文化气质,都具有鲜活上海腔调。个人命运与上海春申机械厂命运绑定,主要人物命运轨迹具有时代普遍性,他们身上印刻着鲜明时代印记,在静水流深的时光流转间,《春夜》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变迁这一现实题材,突显了历史的细节感和生活的历史感,叙述相对平稳而收敛,成为一部走出类型桎梏的现实主义小说。

——评蔡骏的长篇小说《春夜》



一部现实主义的“海派”力作

